

大雅久不作

李国文 著

大家门文学系列

神游千古 放眼时代

慷慨笑作 笔耕学问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国家一级出版社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大雅久不作

大家门文学系列

李国文 著

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国家一级出版社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雅久不作 / 李国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015 - 7

I. ①大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8296 号

大雅久不作

著 者: 李国文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销总代理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: 80670231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6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4. 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 80 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、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- 001 / 大雅久不作
- 007 / “文人无行”
- 014 / “文章得失不由天”
- 021 / 诗人啊，诗人！
- 029 / 曹雪芹的苦恼
- 037 / 最怕胡庸医
- 047 / “升沉不过一秋风”
- 056 / 想象力到哪里去了？
- 065 / 答客问
- 071 / 文人长寿考
- 074 / 头发的功能
- 082 / 眼睛的功能
- 089 / 嘴巴的功能
- 102 / 鼻子的功能
- 112 / 耳朵的功能
- 121 / 舌头的功能
- 130 / 屁股的功能

- 142 / 小人难防
- 147 / 说海瑞
- 155 / 和珅跌倒
- 170 / 唐末食人考
- 184 / 暹罗双胞胎
- 193 / 西窗漫话
- 212 / 主考认错
- 215 / 李贺与《高轩过》
- 220 / 红杏出墙
- 223 / “鹅不知耶?”

大雅久不作

打开《全唐诗·李白卷》，第一首，就是这首《古风》。

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？王风委蔓草，战国多荆榛。龙虎多相食，兵戈逮狂秦。正声何微茫，哀怨起骚人。扬马激颓波，开流荡无垠。废兴虽万变，宪章亦已沦。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群才属休明，乘运共跃鳞。文质相炳焕，众星罗秋旻。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

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：这首《古风》反映了李白的文艺思想云云。

这样说当然也没错。不过，要是有可能与李白先生求教的话，他未必会首肯，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这样子的人士：具有责任感，负有弘扬雅正之音的使命。虽然在这首诗中，他忧心忡忡地呼吁“大雅”之作的出现，洋溢着“拨乱反正”的精神，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，现在流传下来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，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这个准则，更不会始终如一地在身体力行着了。

有人认为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，这是根据他引用孔夫子的话“甚矣，吾衰也”而来。我认为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，往往讳言其老，而李白在六十一岁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，作为一个充军贵州的囚徒，绝不是那么快活的，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文学动态。但这首诗，也不会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。那时，他在长安城里，活得太滋润，太优哉游哉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，哪还有心思顾及文学。我认为，这首《古风》，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（公元744年）离开长安以后，已经很失落，

但未很失败的期间写的。

写正统的诗，他未必坚持正统。对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，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，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，无异于精神的奴役。如果我们理解李白，他在人格上，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的话，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。

在文学史上，凡大师，无不处于矛盾和思想冲突之中，李白尤甚。一方面，对于利禄声名、飞黄腾达的企羡之心，对于立功当世、以邀圣宠的非凡之想，强烈得使他几乎不能自己。一方面，又想浪迹天涯，徜徉山水之间，啸歌行游，把酒赋诗，及时行乐，不受羁束。但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？不过在口头上如此标榜罢了。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，假模假势地要去隐遁，可又不肯走得太过远，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。隔三岔五，假借回城买方便面的理由，又跑到都城里来窥探动静。

作家也好，诗人也好，安分者少，所以，李白也不例外。总是在山林间，不为世知，也不是办法；当苦行僧，没得酒吃，嘴里淡得出水，也很受煎熬；诗写得再好，若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，也是白费工夫。于是诗人急了，早先，他就给荆州刺史韩朝宗上书自荐：“十五好剑术，遍干诸侯，三十成文章，历抵卿相，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丈”，“请日试万言，倚马可待”，何“不使白扬眉吐气，激昂青云耶”。渴望之情，溢于言表。后来，在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中自抒胸怀，“申管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”，抱负之大，就更不得了。

这就是诗人的狂放性格了。太充分的自信，与吹牛相差无几。不过，就算是吹牛吧，你也不能不为这位大诗人吹得那份大气磅礴、地动山摇而服气。反观近来那些口出狂言，以为语惊四座者，相比之下，恐怕只能等于阳痿患者的偶尔勃起的小意思了。

别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业，报效朝廷，“南风一扫胡尘静，西入长安到日边”，但是，他心灵深处那压根儿的反潮流，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

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是他永远也解不开的矛盾。最后，他连唐玄宗的文学侍从——供奉翰林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，也干不下去。本来李白一门心思参政议政，以为从此可以大显身手，大展雄图，谁知李隆基却只要他写诗，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，哄杨贵妃开心而已。

在帝王眼里，奔走宫廷的御用文人，与华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监一样，不过是侍候人的。被贺知章捧为“谪仙人”的李白，怎么受得了这种“倡优同畜”的待遇，终于打了辞职报告，卷起铺盖，告别长安。也许，他未必真心想走，说不定一步一回头，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，与圣上热烈拥抱呢！我们这位大诗人，在兴庆宫外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到，只好撅着嘴，骑着驴，出春明门，东下洛阳，去看杜甫了。

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，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，在野与在朝，又想吃又怕烫，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，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，不放心，断不了收拾，甚至杀头的原因。

所以，李白这首《大雅久不作》，只能作为一个很特殊的例子来看。清人沈德潜编《唐诗别裁》，也将他的这篇作品与他整体创作区别开来。“太白诗纵横驰骋，独古风二卷，不矜才，不使气，原本阮公，风格俊上，伯玉《感遇诗》后，有嗣音矣！”

“矜才使气”，才是诗人李白的创作和为人的风格。我们谈作家，谈作品，一定要区别其复杂性、具体性、多义性、特殊性。采用“一言以蔽之”的方式方法，往往难中鹄的。每一个作家，都是他自己，也就是黑格尔说的“这一个”。作家与作家之间，异同之处，应该要大于相同之处。作家自己的作品与作品之间，也应该如此才好。一个与别人过于相同，与自己过于相同的作家，我敢肯定，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。

但是，一些评论家和研究者，无论是拼命染黑头发，不甘过气的名流前辈，还是刚长出小胡子、做深沉状的新锐先锋，无论是用耳熟能详的老语言，还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词，来分析作家与作品时，总是习惯于“眉毛胡子一把抓”的考量方式。对于这类执行“六经注我”政策的先生们，实在令人好不痛苦。

于是，不禁使人想起希腊神话里那个达玛斯忒斯。

这个拦路大盗，可真是厉害，谁要不幸住进他的客栈，比落到《水浒传》里那孟州路上、十字坡旁、母夜叉孙二娘开的人肉包子店里，命运也好不了多少。凡住进他黑店的客人，个头长于铁床者，截短；短于铁床者，抻长。我不知道当下这班评论家和研究者，怎么得到达玛斯忒斯的衣钵真传，以铁床逻辑行事的。反正，在新时期文学中，一些被尊之为“爷”一级的评论家，那种扬之即生、抑之则毙的霸道，恐怕就是达玛斯忒斯铁床的极致表现了。

由于纳入这种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，李白这首对于文学状况的不怎么满意的诗，一下子就有“高瞻远瞩”的味道了。其实，这首《古风》中写出来的“圣代复元古，垂衣贵清真。群才属休明，乘运共跃鳞。文质相炳焕，众星罗秋旻”的颂德词句，应该看得出来，诗人一方面借重官方，加大他对于“大雅久不作”的批判力度；一方面也有讨好主流意识的用心在。以求赏识和冀得擢用，一直是李白的致命伤，否则，他不至于站错队，“为君谈笑静胡沙”，去为野心家永王效力，而流放夜郎了。

在这首诗中，只有这两句，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，可称诗胆，也是李白写这首诗的主旨。编《唐诗别裁》的沈德潜，在选用这首诗后，特地加了个注：“昌黎云，‘齐梁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’。太白则云，‘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’，是从来作豪杰语。”说明他认同这个看法，但是又注了一句：“‘不足珍’谓建安以后也。《谢朓楼饯别》云：‘蓬莱文章建安骨。’一语可证。”他引李白自己的诗，把建安诸子区别在“绮丽不足珍”之外。实际上，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，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韩愈的观点的。

自古以来，在文学领域里，雅正之声和绮丽之音，这两种思潮的抵牾，孰高孰低，孰轻孰重，一直是争议的题目之一。在李白以前的半个世纪，陈子昂那首有名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怅惘；在李白以后的半个世纪，韩愈的“齐梁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”的否定，都证实了从两晋南北朝，直至隋一统的三百多年间，绮丽之音，愈趋侈靡淫

巧，浮艳颓废，致使文学走进了死胡同，丧失生机。正如有些人玩文学，玩到最后，把自己也玩进去一样。看来，李白的“大雅久不作”，“绮丽不足珍”，显然是有感而发。

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，“甚矣，吾衰也”，说自己老了，没有力气写大作品了。但是，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文学不能尽是风花雪月，吹拉弹唱，男欢女爱，床上功夫，更需要像《诗经》中《大雅》那类具有史诗性质的鸿篇巨制。要是好久好久没有出现这类严肃的、认真的、深切的、有文学价值的反映历史和现实的作品，是无法向时代交代的。

所以，他在诗中表决心，“我志在删述，垂辉映千春。希圣如有立，绝笔于获麟。”要以孔夫子著述《春秋》的严肃，整理《诗经》的热忱，重塑时代的黄钟大吕。诗人虽是这样表态，但也不妨碍他去写“春风不相识，何时入罗帷”、“玉阶生白露，夜久侵罗袜”等玲珑剔透的小诗。雅正之声不可或缺，绮丽之音不可偏废，这两者，其实应该是相辅相成的。

只有周作人，只有沈从文，只有张爱玲等几位顶尖的“红人”，能支撑得住“五四”以来的现代文学吗？这几位被评论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态的鼓吹而成神成圣的作家，在他们笔下的20世纪前半叶，除了精致的绮丽之音，诸如绅士闲适、墨客雅兴，男情女欲、悲欢爱仇，香奁脂腻、帘卷春色，小草小花、青山绿水外，还能给读者什么呢？一部没有了鲁、郭、茅，没有了巴、老、曹的现代文学史，拿在手里，还会有多么重大的分量呢？

在进入21世纪，开始一个新的千禧年的时候，重新读李白这首“大雅久不作”，不知为什么，倒颇有一点耐人思索之处。尤其在“吾衰竟谁陈”的感慨中，透出诗人对于文学状态那种深深的遗憾，还带有一些无奈，不能不感到一种震动。

历史，有时会不厌其烦地重复，文学史也同样，有时会呈环行状态的运动方式，走了一大圈弯路以后，又回到始发点。在上一个千禧年来临的时候，公元1000年，算起来应该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，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，简直令人不胜讶异。唐以后的梁唐晋汉周，又重蹈两晋以后的宋齐梁陈隋的覆辙，等于重新拷贝了一回。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的局面，

又一次出现。1000 年的中国文坛，不免显得荒芜冷落。说是空空如也，有一点委屈时代；说是不甚好的年景，或许更接近事实。比之两百年前李白、杜甫的盛唐，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隐、李贺的晚唐，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，也就够后人眼花缭乱的。但第一个千禧年钟声敲响的那刻，翻开中国文学史，宋之初，可堪称道的作家和作品，屈指可数。

“唐之文，涉五季而弊。”《宋史》的这个评价是很确切的。五代时以华艳词藻写男女情事的作品，以《花间集》为代表的那些旅愁闺怨、合欢离恨、轻狂冶游、燕婉情私，也差不多写到尽头了。北宋初期的诗文，仍受五代影响，没有什么起色，也很正常。文学进入了低潮期，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。确实也是这样，大约过了半个世纪，公元 1050 年到 1100 年，便出现以范仲淹、梅尧臣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以及苏轼等为代表的北宋文学辉煌期。文学的断档，倒有可能正是为下一个繁荣时代积蓄力量的时期。

我在想，当代中国文学，经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，各式各样的实验和尝试以后，成绩不可不说是伟大，收获不可不说是丰硕。其中，绮丽之音这部分，似乎也到了淋漓尽致的田地，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写、不敢写和不会写的。相比之下，大雅之声这部分，也就是史诗式的不朽之作，还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之中，望眼欲穿。坦率地讲，像唐宋八大家那样对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巨人，像唐诗、宋词那样千古传诵的名篇，能与之相比拟的当代作家和作品，一时间，竟不能屈指数来，还是很令我们后人感到汗颜的。

然而，在新人辈出、后来居上、总结经验、开拓未来的年代里，没有理由不相信明天会更好。因为，宋齐梁陈隋也罢，梁唐晋汉周也罢，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不宁、战祸相继的年代，这期间的文学史出现空白、断档、走弯路，是不足为奇的。如今，民族腾飞，国家复兴，那么，与之相称的“盛世文章”、“汉唐景象”，也是自然而然必将到来的事情了。因此，在这千载难逢的盛节里，真诚期望第二个千禧之年，带来中国文学更大的辉煌。

“文人无行”

鲁迅先生在《集外集拾遗》的《辩“文人无行”》中说：“轻薄，浮躁，酗酒，嫖妓而至于闹事，偷香而至于害人，这是古来之所谓‘文人无行’。”这里所总结的轻浮儇薄、躁狂狷急、醉生梦死、性事糜烂，倒也是被世人物议的无良文人们的典型表现。

“文人无行”，语出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：“观古今文人，类不护细行，鲜能以名节自主。”作家们行为不检、有欠自重、名声败坏，贻人笑柄，在文坛上的这类丑事糗事，确是从来不绝的。曹丕的话里，我们多少还能听出一点宽容之意。但后来的史书记载，对此种现象，颇多诟言，便不那么客气了。也许，古代文人在这方面的表演，要更招人反感些，方才绳诸笔墨，予以针砭的。

当然，如今的作家中，有教养者愈来愈多。所谓无行的文人，总的来说在减少着，应是不争的事实。无论如何，世纪交替，文明进步，发展趋势，历史必然，作家整体素质的提高，那是毋庸置疑的。

因此，时下偶尔出现的，那些一定要往地毯上吐痰，一定要从窗口向外撒尿，一定要从摩天高楼上往下擤鼻涕，一定要随手牵羊从宾馆顺走些什么，一定要吃约稿女编辑的豆腐甚至动手动脚，一定要住星级饭店不然就会失眠，一定要有左拥右抱的三陪才会诗兴大发，一定要麻将打到天亮眼珠通红走出房间的文人，相对于古人的表现来说，是小小不言的无行了。

我们有理由为这种进步而高兴。如果翻一翻宋代端明殿大学士宋祁所修的《新唐书·文艺》，看看他给唐代文人画的像，就会觉得上述边幅不修的诸位哥儿们，和一定要写自己与多个男人滥交经验的姐儿们，简直是

非常好样的了。

宋朝的宋祁绝无存心糟蹋唐朝文人的意思，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《题司空图诗卷末》中得到证明。他说：“噫！表圣，贤者也。以其贤故，一言一物为后人爱秘若此。宁当时之人举不及后人之知表圣耶？是不然，同时者，异时者慕，尚何怪哉！”看出他是个很客观和实事求是的学者。

唐代诗人司空图，字表圣，自号休休子，又号耐辱居士。冲其字号，知其自许甚高，故而不甘世俗。原来，他也曾很自负过的，认为有宰辅之才，后因求官不售，便遁迹中条山中，做到了真正的背靠文坛。不像当今一些声称与文学“拜拜”的名家，虽欲隐而难耐寂寞，时不时在小楼上用望远镜东张西望，如同唐代那个叫卢藏用的文人，“往来于少室，终南二山，时人称之为‘假隐’”一样，是一种以隐求显的伪君子，不足为训。

司空图说隐便真隐了，最后召他为礼部尚书都不干。躲在山里，潜心从事诗歌理论研究，一部《二十四诗品》，至今还是诗歌评论界的基础读物。宋祁很尊崇他，所以这几句话写来也很有感情。宋祁所谓“媚”，即嫉妒，表现在文人身上，便是彼此相轻。对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，“媚”，没有什么稀奇，由于名利、权位、风光以及莫名其妙的欲念而引发的竞争，而产生恨不能将对手生吞活剥的歹毒心理，是可以理解的。见别人写得稍为好些，活得稍为强些，马上嫉妒得眼露杀气，心怀叵测，做出种种张致，甚而下作无耻，都是可能的。但相隔一段时间以后，前人成了故人，故人成了古人，彼此无利害冲突，感情自然是“慕”而不是“媚”。宋祁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因此，他没有必要说唐人的坏话。

何况宋祁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作家。虽然他的小词写得很是清丽可爱，但他相当谦谨自约，为人赞许。他的《玉楼春》：“东城渐觉风光好，縠皱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”仅点出春天绚丽的这一个“闹”字，其贴切准确的程度，也足以垂范千古。但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和《治戒》一文中，再三强调其水平“学不名家，文章仅及中人”。他要看到后来一些自封或人封的大师，自称或人称的经典，自以为或人以

为的不朽和传世，一定会惊叹这些无良文人那不亚于城墙厚的脸皮，而自惭弗如。鉴古知今，同样，以今解古，宋祁在《新唐书》里描绘唐代文人的笔墨，应该是可信的。

如：“崔信明，蹇亢以门望自负，尝矜其文，谓过李百药，议者不许……坐怨谤流死。”

崔信明“以门望自负”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也就是恃出身好、成分好来压人。这种以非文学手段在文坛拔尖称霸消灭对手的做法，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照方抓药。其实，李百药在唐初文坛，不但资格老，而且著《齐书》五十卷，已有定论。但小文人通常就是这样没起子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，就是不服气比他哪怕出色一点的同行。自负，是文人差不多的共同弱点，一旦无可骄傲还偏要骄傲的话，十之八九会产生歇斯底里。崔信明非要认为自己胜过李百药，而大家不承认，不买账，嗤之以鼻。于是，气极生疯，至少是患了轻微的躁狂性精神病。这样的人，必然要不停地折腾，一直折腾到死为止，最后因怨谤而流死，也是活该了。前几年我们也曾见识过这类人物的，结果又如何呢？最后还不是以成文坛笑柄被人不齿而告终？

如：“李勣戒刘延祐曰：‘子春秋少而有美名，宜稍自抑，无为出人上。’”

看来，刘延祐年轻时，就很出名了。少年有成，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才使得老干部对他进行这番善意的教导。李勣是唐初开国元勋，资望很高，把他惊动出来，可见这位神童作家大概张狂了一点。有才华，即使盖世，也不能像南朝谢灵运那样自诩：“天下才有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”谢灵运最后闹得在广州弃市，焉知不是骄傲的缘故才把脑袋弄掉的？因此，一个年轻作者，写了几篇作品，瞎猫碰死耗子，红了，完全用不着亢奋得睡不着觉。文学是个漫长的竞赛过程，而做人更是一辈子的事。所以，刘延祐接受了老将军的劝告，后来，他的吏治在历史上还是被肯定的。

如：“张昌龄为考功员外郎王师旦所绌，太宗问其故，答曰：‘昌龄华

而少实，其文浮靡，取之，则后生劝慕，乱陛下风雅。’帝然之。”

现在很难评断王师旦对张昌龄的诤难，是不是有些类似时下新潮作家，或者实验作品所受到的非议一样。初唐处于文学变革的时期，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流派出现，各尊一宗，互有长短，有人赞成，有人反对，自不足奇。但从李世民对他发出的警告来看，语气够重的：“昔祢衡潘岳矜己傲物不得死，卿才不减二人，宜鉴于前。”估计张先生的不佳表现，是文字以外的事情了，史书未载，不敢悬拟。但对一位政治家而言，浮靡文风事小，“后生劝慕”所导致的结果事大，是不能不在乎的，就不得不举出魏晋时死于非命的两位文人，给他敲敲警钟了。

如：“杜审言恃才高以傲世……尝语人曰：‘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，吾笔当得王羲之之北面。’其矜怪类此。”

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，而宋祁称杜甫的性格，也得其祖真传，是很“褊躁傲诞”的，没准这倒是他们家族的基因遗传了。文人爱口出狂言，非此一例，但像杜审言这样有得狂的狂，多少还说得过去。那么，一些无得狂的狂的作家，蚍蜉撼树，螳臂当车，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。后来，“审言病甚，宋之问、武平一省候何如，答曰：‘甚为造化小儿相苦，尚何言然，吾在久，压公等，今且死，固大慰，但恨不见替人云。’”这种当惯了老爷子的口气，何其耳熟能详呀！其实，大家明白，文学成就的高低，与年齿的增加，并不成正比的。因此，老作家不等于大作家。而尊老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，尊重其人，未必就是尊重其文。但作家一老，便把人们对其上了年岁的尊重，看作自己文学上令人高山仰止了。所以，这种当老爷子的欲望，愈老，也愈强烈，杜审言自然不是唯一的例子。

如：“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，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。万顷敏文辞，然放达不治细检，无儒者风。”如：“凡天子飨会游豫，唯宰相及学士得从……帝有所感，即赋诗，李适等学士皆属和。当时人所歆慕，然皆狎狠佻佻，忘君臣礼法，唯以文华取幸。”如：“阎朝隐，性滑稽，属词奇诡，为武后所赏，累迁给事中，仗内供奉。后有疾，令往祷少室山，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，请代后疾。还奏，会后变愈，大见褒赐，其资佞谄如此。”

这些御用文人，十之九都非善类。明代的沈德符描写过：“词臣日偃户高卧，或命酒高会而已。”好像很轻松，很潇洒，除喝酒做诗外，就是睡大觉了。其实不然，能巴结到统治者身边的文人，绝对是拍马屁、哄皇帝老子开心的高手，而且要巩固住御用的地位，必无所不用其极地上拍下踹，独领皇帝对他的恩幸，还不遗余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，以诛杀同类来邀宠讨好。元万顷等文人，实际是宫廷里用来分宰相行政权的特别秘书班子，一时间，权重势炽，是炙手可热的差使。唐代，宰相在南衙办公，而这些直接受命于高宗或武后的文人，都是从北门进宫，舞文弄墨，插手政治，人们才把这些品格卑污、行为齷齪、轻浮浅薄、不讲廉耻的文人，蔑称之为“北门学士”。

据《朝野僉载》，这类堕落文人的丑态，更有甚者。如：“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，云是王子晋后身，于缙氏山立祠。诗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，舍人崔融为最，后易之赤族，佞者并流岭南。”如：“唐天后内史宗楚客，性谄佞。时薛师有之宠，遂为作传二卷。论薛师之圣，从天而降，不知何代人也。释迦重出，观音再生。期年之间，位至内史。”如：“崔湜谄事张易之与韦皇后，及韦诛，复附太平公主。有冯子都、董偃之宠。妻美，并二女并进储闈，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。有榜之曰：‘托庸才于主第，进艳妇于春宫。’”如：“唐天后时，张岌谄事薛师，掌擎黄膜随薛师后，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蹬。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，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。并偷媚取容，实名教之罪人也。”

无行文人之下流无耻，莫过于此了。崔融、宗楚客之流，竟以诗文来谄媚溜舔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和僧人薛怀义，宋之问甚至为张易之捧尿壶，还做出不堪入目的样子献媚权贵。如此不择手段的阿谀奉承，说他们是名教之罪人，是一点也不错的。最下作的，还数那位崔湜，他“美容仪，早有才名，与兄弟等并有才翰，列居清要，每私宴之际，自比王谢之家”。就这样一个贵家子弟出身的文人，竟以自己的姿容，甘为男妓，去当太平公主的面首。这还不够，为捞到一份官职，把老婆和两个女儿送到东宫，供太子寻欢作乐，连最后一点人味也丧失殆尽了。

一个文人，琢磨怎么样走门子、拜码头、串高门、攀名流的话，研究如何去捧臭脚、拍马屁、当走狗、卖灵魂的话，这样无行下去，文坛便真的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了。就是那个捧尿壶而自得的宋之问，看到另外一位诗人刘希夷写的一首《代悲白头吟》，其中有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绝妙联句，嫉妒得要死，自己又写不出，于是找人用沙袋压死了他，将这首诗窃为己有。

无行到了极点，便无法无天了。所以，宋祁在《新唐书·文艺》的序文里，一上来就谈到文人中的这类小人，“恃以取败者有之，朋奸饰伪者有之，怨望讪国者有之”，不胜感慨系之。

在他这篇著作中，被点到的还有：

如：“孟浩然，有文无行，好蒲博嗜酒，娶妻唯择美者，俄又弃之，凡四五娶。”生活上的不检点。如：“刘太真，迁礼部掌贡士，多取大臣贵近子弟，坐贬信州。”作风上的不正派。如：“崔元翰，好学，老不倦，用思精致，驰骋班固蔡邕间。以自名家，怨陆贽李充，乃附裴延龄。延龄表钩校京兆，妄费持吏甚急，而充等自无过，讫不能傅致以罪云。”品质上的不可信。如：“李益，少痴而忌克，防闲妻妾苛严，世谓妒为李益。”精神上的不健全。据说，他为了防止妻妾红杏出墙，每晚要在她们房屋四周和门口，撒上白粉，作为隔离带，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。如此禁锢防范，简直成了变态狂人。

所以，文人无行，在唐代是比较普遍的现象。《太平广记》卷一八三引宋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：“唐末举人，不问事行文艺，但勤于请谒，号曰精切。”一直到宋代，秦观在《谢王学士书》中叹息：“每观今时偶变投隙之士，操数寸之管，书方尺之纸，无不拾取青紫为宗族荣耀，而已独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滨于饥寒。”可见一时风气。

甚至诗坛的初唐四杰，同时代的有识者对他们的品格和行为，也是不以为然的。宋朝孔平仲《续世说·识览》中指出：“王、杨、卢、骆，谓之四杰。裴行俭曰：‘士之致远，先器识而后文艺。勃等虽有文才，而浮躁浅露，岂享爵禄之器耶！杨子沉静，应至令长，余得令终为幸。’”他预言的